

【文学与艺术研究】

论避籍制度与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

——以贵州为考察中心

李 黎

摘 要:清代边省文学发展迅猛,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这与避籍制度有很大关系。避籍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另一方面也迫使不愿外出就职的文人选择回避制度要求相对较弱的教职,为边省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说来,避籍制度对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江山之助不仅促进边省本地外出文人的创作,而且边省风景与风俗也激发了入边省文人的创作,丰富了边省文坛。二是避籍制度扩大了边省文人外出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增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三是避籍增进了主流文坛对边省文学的了解和认同,促进了边省文学的传播。避籍促进了文人的互动。

关键词:避籍制度;边省文学;清代文学;文学制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2-0137-06

在经历唐诗与宋诗两个范型之后,清代诗人面临一个创新的焦虑,清诗整体上往往表现出向纵深发展的一面,却较难有大的突破。而边省文学,作为清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却表现出长足的发展。黎庶昌《泂泂故事》引甘泉谢堃语云“或谓边省诗文不及三江,余独不然其说”^①,并胪列贵州重要诗人的诗句作为例证,且曰:“以上贵州一省而言,其他可知”。到了晚清时期,边省诗文发展尤为迅疾。梁启超注意到“咸同后,竟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其稍有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②。同时,边省诗人也表现出强烈的诗文自信,郑珍在《播雅》卷四中称罗兆甡是“遵义诗人之冠冕”,说“若使旗鼓中原,与朱王数子上下驰骋,未知谁拔赵帜”,反映了郑珍意欲旗鼓中原的潜意识。边省文学在清代的异军突起,主要原因在于清代统治者对于边省的治理、开发和以文化之的文教政策,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官员的避籍制度。

避籍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职官制

度,是指某些级别的朝廷命官按规定不得在原籍任职的回避制度。中国古代任官回避制度创立于汉代,至唐宋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明清时期则不断完善。回避制度主要有避籍和避亲,避籍是官员任职回避制度的一种。避籍之籍包括本籍、祖籍和寄籍。清顺治十二年(1655)规定:外官回避本省,教职回避本府,户刑工部司官回避本省。康熙四十二年(1703)规定,初授外任官,距其原籍五百里之外,方许其做官。但儒学教官特殊,可以选用本省人,但需回避本府。

避籍制度一方面实现本地官员的走出,一方面方便外地官员的流入,促进了官员的流动。在八股取士制度下,官员多进士、举人出身,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下,官员往往身兼文士之职。因此,官员的流动代表着大部分文士的流动,文学的发展是在人的流动与互动中产生的。从宏观角度看,地域文学也是在不同地域文士的沟通、竞争、碰撞、融合等互动中发展起来的。清代大量文官文人群体离开原籍,

收稿日期:2020-12-09

* 基金项目:贵州省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文化单列重大课题“贵州古代诗歌史”(18GZZB27)。

作者简介:李黎,女,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贵阳 550025)。

通向大江南北,促成不同区域文化文学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边地文学的发展。

一、避籍制度下边省文人的出与留

出仕是很多文人的理想,走出去对于边省文学发展是重要的一环。但在避籍制度下,边省文人面临走出与乡居的选择。安土重迁是中国长期农业社会下的心理固态,尽管边省被很多外来流官视为畏途,但对于本地文人来说,有时他们宁愿固守家乡,或者选择离家较近的教职,以尽孝养之责。毕竟孝养与天伦之爱也是儒家文化所固守的,是深入文人骨髓、融入血液的文化基因。避籍制度下对地方各级学官,即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学校中的训导,要求较宽。教职只需回避本府,即可在省内其他各府任职。^③并且朝廷对于边省教职人员多有体恤。例如教职人员六年俸满,例有该督抚学政共同甄别。《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5)六月,曾有上谕:“教职一官,寒毡可念,远道孤征,舟车仆从之资,不无多费。僻在边省者,转瞬六年,尤为仆仆。嗣后各省甄别教职,云贵川广福建湖南甘肃等省,俱著改为八年一次。”并且以训蒙为生、舌耕度日也是当时不得志文人的普遍选择。陈芳生《训蒙条例》记载:“儒者不为农工商贾,惟出仕与训蒙而已。出仕不可必得,训蒙乃分内事,果尽其道,则教育人才亦大有于天下,己亦藉此代耕,诚兼善之本务也。”^④边省文人回归乡邦之后,在任职回避制度下,多选择从事回避制度要求较为宽松的教职。

贵州莫友芝之父莫与俦,于嘉庆六年(1801)被分发四川,先后为茂州知县、盐源知县,政绩卓著。嘉庆九年(1804)他被举荐为乡试同考官,因丁父忧去职,以终养太夫人为由乡居,母亲去世后他在回京路上改变主意,请求改教职。当时他已经行到襄阳,他反复思考:“吾壮也,犹不能诡随;今将老,知愈凿枘。吾历京外官,养亲仍不出束脩,今将求仁者粟以祀,又免选粟之羞,其校官乎?”^⑤后来,他请得遵义教授,乡居十四年之久。

又如被誉为“西南硕儒”的郑珍被程恩泽赏识,拔贡成均。母亲黎氏告诫他说:“所望汝得名者,冀不堕先声,为科目,儿侍裙屐耳。宦险路,一行作,即我生死不见知。春秋榜命可再取,可勿图仕。即艰食,可授受学给。我惯破衣粗齏,杭织海错无取

也。”^⑥他的母亲同样认为家人的团聚胜于异乡仕宦,即使为生活所迫,也以选择授学为好。

江浙之地为人文渊薮,是很多文人雅士向往的地方。郑珍的学生胡长新道光丙午科举人,连捷成进士,被授予江苏知县。他却以母老请求改为教职,被改派为贵阳府教谕,自言“我归本誓墓,卜兆愁荒坟”^⑦。郑珍有《胡子何来山中喜赋此》:“东南财赋地,民社命子治。世人热中肠,得此两足飞。金银梦布地,谁肯去若遗。子乃请归假,不顾人笑痴。依依慈母前,两年啜哺糜。”^⑧郑珍五十八岁时因大学士祁藻举荐,被征为江苏知县,但他身患喉疾,无意仕途,亦终未成行。

贵州犹法贤曾有补贵州镇远广文的经历,傅玉书为之赠诗曰:“竟以归为仕,黔山接楚河。……几年书上考,不苦拙催科。”^⑨他认为犹法贤任职广文比被催赋税好。傅玉书又有《送唐汉芝归补学博》:“作官偏喜作儒官,日对生徒说邹鲁。既无膏泽负苍生,况有清贫谢州府。”^⑩由此可见他的性格,亦可发现黔人喜欢教职生涯,且不喜欢外出做官。

由上可见,边省文人虽然期望走出去,但由于侍奉父母、照顾家庭等牵绊最后很多人选择了留守家园。得与失往往是相对的,边省诗人选择留下,虽然不利于边省文学的传播,但留下来的文士多从事教职,为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莫与俦回乡后,“遵义之人习闻君名,则争奏就而受业。学舍如蜂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⑪。

二、江山之助与生活在别处

当代学者蒋寅关注清诗的写作困境及其应对策略,提出了“生活在别处”的说法:“虽然我们都置身于日常生活,但对诗歌来说,有价值的‘生活’却在别处,在褫除日常经验的地方。”他认为摆脱日常生活的途径之一就是“离开久居的环境去往异地,如旅行、游览,改变现实中的经验空间”^⑫。诗歌创作需要江山之助几乎是中国古典诗学的公论。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曰:“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明代宋濂《刘兵部诗集序》中云:“非得夫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清代沈德潜《芳庄诗序》曰:“诗人不遇江山,虽有灵秀之心,俊伟之笔,而孑然独处,寂无见闻,何由激发心胸,一吐其堆阜灏瀚之气?惟

两相待、两相遇,斯人心之奇,际乎宇内之奇,而文辞之奇得以流传于简墨。”^⑬

避籍制度在无形中增加了边省诗人的走出机会,扩大了他们的视野,边省诗人的诗作与地域关系密切。贵州毕节路璜的老师熊小桥,在《小桥自识》中自序其随父外出与居乡的创作经历,对比鲜明:“先君子宦游山右、粤西,课读时尝以学诗为谆谆。厥后,先君子客中州,余就省觐。从此入淮泗,达维扬,渡江而南,过苏杭,溯严滩而上,逾新安,由南昌、长沙以反于黔。……至于浪迹归来,家徒四壁,吟情顿减。久之,心源已如废井,读书过目辄忘。”^⑭这说明没有江山之助,诗人的创作几乎荒废了。

江山之助开阔了诗人的视野,极大地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热情。李湖《田南村先生传》称贵州田榕“屡泛洞庭,浮江汉,留金陵、吴门最久,住西湖上又三年,中间往来齐鲁、宋卫、燕赵诸邦,宦游金陵、敬亭、采石、云梦之间,所在题咏都遍。其为诗一以冲淡自然为宗,而遇山险峻,笔力辄争雄长”^⑮,故其诗得江山之助良多。贵州籍诗人何德新自云:“仆性嗜佳山水,凡所游历,辄欲深入。自辛酉冬入都,历楚、豫、燕、赵、齐、鲁,出吴越,盖为省亲计也。”^⑯何德新把该时期的诗歌归为一集,名曰《五湖集》。贵州陈钟祥祖籍浙江山阴,历官青神、绵竹、大邑知县,擢沧州、赵州知州。他一生奔走他乡,“行年四十九,犹自风尘走”^⑰,故自称“余东西南北之人也”^⑱。他的《依隐斋诗钞》一官一集,分为《辛壬癸甲草》《燕晋草》《南归草》《蜀游草》《康邨草》《祥琴草》《出山草》《东航草》《橐笔草》《牧仓草》《燕南赵北草》。所作诗多于仕宦或回家途中,《〈祥琴草〉序》曰:“所过间有登览,辄为断句纪之。”^⑲

一个地域的文坛不仅仅由本地籍贯的人组成,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外来客籍人员创作于该地的作品也可以视为该地文坛的一部分。边省的异域风光与独特民俗亦往往成为入边省诗人的创作动力。钱仲联评价贝青乔曰:“游云南、贵州、四川诗,诗境得江山之助,刻画奇险,独辟蚕丛,显得能手的无所不有。”^⑳孙杰《竹枝词发展史》曰:“对少数民族生活及风俗的关注与书写,大概始于明代。到清代,则蔚为大观。”^㉑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省,而文士之所以进入边省,避籍仕宦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于诗人来说,异地山水不仅丰富了诗歌创作的内容,甚至改变了诗人的创作风格。乾嘉时期著名诗人舒位于

嘉庆二年(1797)因参黔南军幕入黔,嘉庆四年(1799)回吴,期间创作《黔苗竹枝词》。宋思任谓其诗曰:“助之以江山,习之以军旅,则又如少陵入蜀后诗之一变。”^㉒

三、以文会友与地域互动

《礼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文学交流不畅是边省文学发展的最大阻力。避籍制度扩大了边省文人外出交流与学习的机会,同时客籍官员也通过联吟互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达到以文化之的政治目的。

边省诗人了解自身受地域限制,存在交流有限、视野狭窄的不足,非常注重向外地学习。陈法论黔人五病,曰陋、隘、傲、暗、呆。其中解释“暗”曰“不通世务,暗也”,为此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亲戚有仕宦于外者,使从之游于通都大邑,见大人先生,聆其议论,日阅《邸报》,与闻世事,则暗可通也。”^㉓张元臣送朋友到嘉定任职时说:“财赋江南重,文章吴会多。他时采风去,倾耳听弦歌。”^㉔他告诫朋友到江南东吴这个文章荟萃之地任职,一定不可错过采风学习的机会。傅玉书送别唐金(字汉芝)去山东时曰:“济南多名士,李杜尝游兹。迩来宋与王,风流宁无遗。君往富吟和,念我贻新诗。”^㉕诗中对唐金外出后的吟和诗作充满了期待。避籍制度加速了边省文人的走出,边省文人走出边省后表现出浓烈的参与意识。贵州周渔璜在京师与同人多举行消夏会,分题吟咏,以《分咏京师古迹得明成祖华严经大钟》而冠绝当时,成为诗坛佳话。

清代统治者武力征服边省后,更加重视文教建设。不仅有学使、学政官员专门负责教育,其他边疆大吏也非常重视文教。严迪昌曰:“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控制的。”^㉖边省文教建设首先缺乏的就是人才的引领,田雯《黔书》中引丁炜之语曰:“兴起文教,为抚绥边荒第一要义。……材不择地而生,黔非所限也。惟倡兴无人,斯废然沮耳。”^㉗正因为如此,不少在边省任职的官员,乐意在当地以文会友,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文风。

例如铜仁唱和是发生在道光三年(1823)十二月底至道光四年(1824)下半年期间的唱和活动,参加唱和的主要有满洲镶白旗署铜仁知府敬文(字廉阶);致仕乡居的铜仁乡贤徐如澍;游幕于黔,占籍石

阡的刘秉彝;云南选拔贵州知县,时任铜江书院山长的郑吉士;朱存红在《铜仁历史上的一件诗坛盛事》一文中统计,此次唱和参与者共 26 人^②,诗词作品 272 首,唱和活动大致进行 12 次。徐如澍为《铜仁唱和集》作序曰:“唯念地灵之久郁,必需提唱之有人。惟我敬廉阶先生,摄篆来兹……为构新思,以光斯地……此时海尾江头,除我尽他乡之客,异日风流云散,对此当接膝之谈。”^③可见铜仁唱和是一场由铜仁知府敬文倡导的跨地域的诗坛盛会。

值得一提的还有輿颂体,这种文体虽以称颂地方官员善政为主,但也是官员与地方文人互动唱和的一种形式。《草堂輿颂》是繁江王维举离任贵州瓮安草塘时的唱和集。该书“序言”中曰:“瓮安苦兵燹廿年矣,弦歌断绝,芹藻蒙羞。得公来培植人材,捐廉月课,邑人士湖湘劝勉,争自濯磨,渐有起色。读公诗益欣然学步,勉事呻吟者唯恐不及。虽颂扬德政,理有固然。然微公有以提倡之,乌能蒸蒸如是。”以上文字虽免不了有阿谀的成分,但亦有一定客观事实为依据。又如周夔,字竹楼,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清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丰十年(1860)任贵州永宁、黄平、郎岱、平远、松桃州厅事,升铜仁守、安顺知府。《所至录》是贵阳人卢戊原、永宁人吴寅邦辑录“輿人僚友之歌颂咏赞”周夔的作品集。贵州人陈灿仕宦云南,历经澄江、楚雄、遂宁等府知府,离开时与僚属有酬唱,后汇为《四郡骊唱集》。

题咏也是文士交往的一种方式,以画为媒介描述有特殊意义的时间,或表达某种情趣,或借此扩大影响。避籍制度扩大了文人们的社交范围,边省文士往往以作图广征题咏。如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周渔璜曾以《桐野书屋图》《西崦春耕图》征诗。题咏诗加深了文士之间的情感互动与意见交流,增进了彼此的论定与推崇。

四、宣传推介与文学传播

文学传播是传播者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将文学信息或文学产品传递读者的活动,文学的传播与所处的时代、地域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如果位于文学渊薮的江南,或者政治文化中心京师,或者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原,舟车辐辏,名流荟萃,其声名自然易于传播;如果处于边省,舟车不通,交通闭塞,人迹罕至,即使有优秀的作家作品,声名也难

以远播。因此,姚江翁在《黔风录原序》中感慨边省贵州文人之难曰:“自古人才应运而生,然莫为之前,虽美勿彰,莫为之后,虽盛勿传。”^④这句话包含着深深的无奈,边省文学文士即使“美”而“盛”,仍然需要“彰”而“传”。边省文学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时代前后的问题,更是一个传播的问题,避籍制度为边省文学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避籍制度为边省文士提供了扩大影响的条件和机会。姚江翁说:“黔固荒服也,其开辟在秦汉以后,固宜无有闻于古者。自前明嘉靖中设科以来,文教渐启,迄乎本朝,治化日隆。声名文物之盛,视前代有加,惟其地荒僻,土之生其间者,虽有所著述,而流播不能及远。四方之士罕有闻焉。”^⑤胡枚曰:“黔省自汉唐以来,虽通中国而僻在南服,声教未施。有明始置郡县,建学校,设科举,人才渐兴。至我朝而文教覃敷,遐迩向化。彬彬化称,极盛矣。然去中州数千里,采风者或偶及至,不能存什一于千百。彼山陬水澨,穷居独处,没世而风采不表见者,何可胜数。”^⑥就明清时期而言,文学传播的主要途径是纸质书籍和文士之间的交流,而有力者的评价与介绍,非常有助于边省文学的传播。边省文学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外来官员的登高而呼,广为宣传。

其次,避籍制度促进了边省著作的传播。边省不仅搜集、刊刻作品艰难,传播更加艰难。贵州著名诗人傅玉书曾苦于贵州文献荒略,辛苦搜辑黔人诗人编纂而成《黔风》24 卷,这是贵州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但该书编成后,他无力刊刻。儿子傅汝怀不忍先人凝聚一生心血的成果被埋没,为了该书能够付梓,他四处奔波,请求各官员论定。《学使程松亭先征访先子遗书,赋呈》《长歌行呈石阡太守何菊农先生》《上贵西观察何竹居先生》《去住难,再呈菊农先生》《上学使钱伯瑜先生》《上制府公相阮芸台先生》《上制府公相伊莘农先生》等作品记载了他的不懈努力。其中提到的阮芸台,即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是清代著名的学者,他所到之处注重搜访文献,在出任浙江学使时曾编有《两浙輶轩录》。他乐于推荐地方文献资料,《江浙二十家诗》《群雅集》皆由其鉴定刊行。道光六年(1826)阮元被委任为云贵总督,傅汝怀《上制府公相阮芸台先生》书曰:“遗书假入先生手,郁湮将廓璞将剖。”伊莘农即伊里布,字莘农,满洲人,道光十八年(1838)升任云贵总督。傅汝

怀《上制府公相伊莘农先生》诗曰：“单行孰靳归群雅，定论还应属大方。”^③。他非常期望这些官员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论定并推广《黔风》。

再次，避籍制度使边省士子走出边省，进入京师、中原、江南等地，接触有一定话语权的文坛领袖，为提高边省文学的知名度创造了机会。清代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文坛的话语权，严迪昌说：“清代诗界的一种倾向，即风雅每由大吏总持，官位与诗名，政界与诗坛一而二，二而一地被打通。”^④这些封疆大吏或者文坛领袖通过接触与了解边省诗人与诗文之后，非常乐意举荐边省作家，传播边省文学。傅玉书在京时与文学家法式善友好，法式善在京城主持文坛近30年，特别喜爱宏奖风流。傅玉书与法式善相识时，法式善正在撰《诗龕》，搜罗当时诗人，傅玉书就“推奖黔人刘养园兄弟，文印川辈不离口”^⑤。法式善著有《梧门诗话》，着意收录边省诗人诗作，对于边省人士亦多加提携。据统计，《梧门诗话》收录贵州4人，广西3人，甘肃1人。《存素堂文集》卷四言：“国朝前辈如王渔洋、朱竹垞，皆著有诗话，宏奖风流，网罗殊富，然于边省诗人采录较少，近日袁简斋太史著《随园诗话》，虽搜考极博，而地限南北，终亦未能赅备。余近年从北中故家大族寻求于残觚破篋中者，率皆吉光片羽，故是编于边省人所录较宽，亦以见景运熙隆，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边省人在文坛领袖面前的大力推荐，边省本地诗人的名字很难传播出去。

随着明清时期文化普及和区域文化的发展，明清地域意识勃兴，文学的地域传统也愈益为人们所自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籍贯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同一籍贯下的人们往往具有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由血缘而地缘，中国人对于生长之地总是还有崇高的情感。“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诗·小雅·小弁》中的这句话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家乡的情感。故而，身处异地的外乡人在有条件时总会为家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最后，在避籍制度下，边省人士通过科举入仕，努力走出边省，并通过自己的行为获得中原社会的认可，为京师、中原、江南等地的文学与文化繁荣做出了边省的贡献。边省文学的被认同是这种文化输出最好的证明方式。贵州周渔璜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选任浙江主考，主持杭州乙酉乡试，得名士淳安方婺如，方婺如与方苞、方舟合称桐城派“三方”。

正因为如此，史申义赠周渔璜诗中有“孰与夜郎争汉大，手携玉尺上金台”^⑥之句。

走出边省的文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活跃一方的文士，并带动所在地域的文学发展，通过雅集、结诗、著作、题序等文化活动，逐渐成为文学互动的中心，显示出自己的话语权。辛亥革命前夕，贵州宦应清在汉口创办汉上消闲集社，并出版《汉上消闲集》，反映了处于暴风眼中的武汉的诗坛情况。贵州陈田编纂的《明诗纪事》可与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三足鼎立。

边省地处边隅，环境艰险，交通闭塞，远离权力中心，无富庶之地的繁华。尽管相对前代来说，清代的交通体系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驿站交通深入边省，但与发达的中原交通网络相比，边省的交通状况依然落后。贵州安顺人杨恩元曾主编《贵州通志》，他在《贵州文献季刊·发刊词二》中感叹：“黔之所以动遭屈抑，不居重要位置者，亦有由焉。良以万山丛杂，舟车罕至，故交通阻隔，风俗朴陋。名人之至黔者即不易，而黔人之外出者亦甚感困难。”^⑦他认为黔南作为边省，文学发展的主要阻碍是人员未能畅通流动。原本为防止官员腐败而施行的避籍制度在客观上打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官员的流动，增进了文化交流，对边省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结语

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罗伯特·纳德菲尔德提出了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属于上层知识阶层，属于主流，居于主导地位；小传统属于底层百姓，属于偏统，居于边缘地位。如果把大小传统的理论运用于地域，无疑中原文学代表的文化呈现大传统的优势，边省的文学是小传统。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认为，汉代的循吏扮演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沟通了文化的大小传统。避籍制度亦让更多的官员成为沟通地域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文学传播者。总之，边省往往多汉族移民，移民与避籍官员具有内在文化精神的融合，文化向心力与吸引力相互结合。在避籍制度下，边省文人在籍贯、户籍与任职地中纠结，边省文学也在合力下发展。

近年来地域文学的兴起，在地域研究视角下，一地有一地的文学。地域文学研究以乡邦文献与乡贤学者为研究中心，重点关注某一地域命名下文学的独特性。但地域之间的互动、融合研究乏人关注，这

应该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独特性与融合性都是地域意识自觉的表现,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独特性是在比较视野下的区别于他域的特性,融合性亦是在比较视野下的沟通与互补。相对于独特性研究,由于融合过程是自然地发生在不以融合为明显目的的不经意的社会实践及文学活动中,是隐蔽的、芜杂的。所以,融合性研究更需要抽丝剥茧,地域融合性将在地域独特性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推进地域研究向纵深发展。

注释

①〔清〕黎庶昌著,龙先绪点校:《黎庶昌全集》(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992—2993页。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岳麓书社,2010年,第98页。③刘建基:《中国古代吏治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④〔清〕陈芳生:《训蒙条例》,《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年,第78册,第719页。⑤⑩〔清〕曾国藩著,邓云生编校标点:《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5年,第262页。⑥〔清〕莫友芝著,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点校:《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689页。⑦②③〔清〕莫庭芝、黎汝谦采诗,陈田传证,张明、王尧礼点校:《黔诗纪略后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43、120、225页。⑧〔清〕郑珍著,白敦仁笺注:《巢经巢诗钞笺注》,巴蜀书社,1996年,第657页。⑨⑩⑤〔清〕傅玉书:《竹庄诗钞》卷五,清刻本。⑫蒋寅:《生活在别处——清诗的写作困境及其应对策略》,《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⑬〔清〕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525页。⑭〔清〕路璜:《蒲编堂诗存》,清咸丰八年(1858)刻本。⑮〔清〕田榕著,黄万机点校:《碧山堂诗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⑯〔清〕何德新:《云

台山人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7册,第495页。⑰⑱〔清〕陈钟祥著,陈琳、严进军点校:《陈钟祥诗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75、849、849页。⑲钱仲联:《近代诗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17页。⑳孙杰:《竹枝词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6页。㉑〔清〕舒位著,曹光甫点校:《瓶水斋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10页。㉒政协平坝县委员会编:《陈法诗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3—134页。㉓⑳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703页。㉔罗书勤、贾肇华、翁仲康、杨汉辉点校:《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㉕据朱存红统计:参加铜仁唱和活动的除了以上四人外,还有陈延绥(号鹤庄,广西临桂儒生)、戴时盛(号竹香,湖南儒生)、姚斌树(号秋士,满洲儒生)、费武曾(号克绳,杭州布衣,宦寓铜仁)、张光郢(号雪楼,湖北京山人,署石阡知府)、陈涛(号少山,浙江人,石阡参军)、托金太(号云田,汉军,任云庵使)、景禧氏(知县宋某泉之妻)、宋元英(朱某泉之女)、王毓濂(号味莲,贵阳秀才)、陈继昌(号莲史,广西临桂人,连中三元)、蒋尚梓(号梦庐,湖南选拔)、刘锡荣(号向斋,直隶通州人,署铜仁知府)、覃武保(号心海,广西容县解元)、祁之钰(号玉珪,山西高平秀才)、祁之铿(号小彭,山西高平儒生)、刘嗣矩(号晓村,山东秀才,都匀知府)、李振堃(号存斋,湖北秀才,清江别驾)、孙皞(号康山,绍兴儒生)、傅冠群(号秋湖,山阴秀才)、黄梗(号兑眉,湖南秀才)、子兰夫人等。见朱存红:《铜仁历史上的一件诗坛盛事》,《铜仁日报》2019年7月26日。㉖〔清〕徐葵、徐承锦:《铜仁徐氏十二代诗集》,1939年。㉗⑳⑳〔清〕傅玉书:《黔风旧闻录》,清道光九年(1829)文经堂刻本。㉘〔清〕傅玉书:《黔风鸣盛录》卷十八,光绪刻本。㉙〔清〕周渔璜著,欧阳震华点校:《桐埜诗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5页。㉚贵州省文献委员会:《贵州文献季刊》(创刊号),贵阳文通书局,1938年,第2页。

责任编辑:采薇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stem of Avoidance System of Official Re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Literature in Qing Dynasty

— Take Guizhou as the Research Center

Li Li

Abstract: The frontier literature in Qing Dynasty developed rapidly and became a prominent literary phenomenon. This development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system of avoidance system of official region. On the one hand, the system of avoidance system of official region promoted the movement of literati in different reg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forced those who did not want to go out to work to choose the relatively weak positions required by the system of avoidance system of official region. It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personnel training in border provinces. Specific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avoidance system of official region on the frontier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ravel not only promoted the creations of the local literati in the frontier, but also stimulated the creations of the literati from other provinces and enriched the frontier literature. Second, the system of avoiding citizenship expand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literati in frontier provinces to go out for communication and study, promoted the regional mobility of literati, and enhanc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i. Third, it enhanced the mainstream literary circle's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frontier provinces, and promote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frontier provinces.

Key words: the system of avoidance system of official region; frontier literature; liter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literature system